

· 跨文化论坛 ·

# 国籍与职业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

彭世勇

(汕头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 在对中国和泰国的833位英语专业大学生、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国人的跨文化敏感度要比泰国人高;而在中国和泰国的各自样本内,英语专业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的跨文化敏感度要高于非英语专业学生。研究结果证明,在文化价值取向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集团内部,存在着文化行为和交际行为的显著性差异,这些差异根据经典的文化理论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而用跨文化敏感度的五个层面,即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来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但这一研究的局限是没有将英语能力作为变量在样本成员中进行对比。

**[关键词]** 跨文化敏感; 跨文化交际能力; 泰国; 中国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6)01 - 0074 - 07

## 一、前言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人际交流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随着大众传播工具和技术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和飞速发展,跨文化交际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人们无法避免的交际行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要求交际双方具备一定程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身又是一个包含多种能力和技术的综合技能。因此,要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对其多个层面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结果。国际跨文化交际的主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西方文化集团的对比研究上,这样的研究无疑可以产生非常有意义的结果,但是,研究人员大都会忽视相同文化集团的内部差异,而对文化成员产生刻板印象,例如,我们会发现不少跨文化研究都是在对比高语境文化集团成员与低语境文化成员之间的差异<sup>[1][2][3][4]</sup>。实际上,文化价值取向一致的各文化集团内部也存在不少差别,认识这些差别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从微观层面来发现相似文化集团之间的异同。因此,本研究试图解答英语学习经验和跨文化交际实践如何影响不同国籍和职业人士的跨文化敏感的问题。

## 二、背景

Kapoor 和 Comandena 认为,“测试跨文化敏感的方式之一就是看当一个人从一个文化进入到另

**[收稿日期]** 2005 - 03 - 22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彭世勇(1957 - ),男,湖南长沙人,汕头大学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特聘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

一个文化的时候,是否能够适当和成功地调整自己的行为<sup>[5][69]</sup>。实际上,Kapoor 和 Comandena 是将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了。在国际跨文化交际的主流研究中,跨文化敏感、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用能力(intercultural adaptation)和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sup>[6]</sup>。目前,国际学术界虽然对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已经基本趋向一致<sup>[7]</sup>,但对于跨文化敏感仍然是各持己见。Wiseman 在总结几十年来的国际跨文化主流研究时指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应该包括相关的文化知识和与异文化成员进行有效交际的技巧及交际动机<sup>[7]</sup>。从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变量,即认知、情感和行为。Chen 和 Starosta 则指出,具有跨文化敏感的人,有希望被别人了解和欣赏的需求,同时,他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时候能够接受文化差异<sup>[6]</sup>。但这个跨文化敏感的定义仍然没有从本质上将其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区分开来。后来 Chen 和 Starosta 在重新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的时候,提出了与 Wiseman 一致的解释,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不同的层面<sup>[8]</sup>。换句话说,跨文化意识表现的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跨文化敏感体现的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跨文化交际能力行为层面的具体表现则是交际者能够取得交际行为的预期目的。很明显,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各层面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的特点,它们之间不存在相互排斥的独立关系。

由于跨文化交际能力与交际效果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一直是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点之一,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果。例如,泰国教授 Monthienvichienchai、Bhibulbhanuwat 和 Speech 三人的研究证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低受到交际恐惧和文化意识的影响<sup>[9]</sup>,文化意识越高的人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越强,而交际恐惧越高的人跨文化交际能力则越弱。此外,Knutson、Komolsevin、Chatiketu 和 Smith 四人在对交际愿意度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人比泰国人更愿意与人进行交流<sup>[10]</sup>。由于 Knutson 等四人是分别对美国人和泰国人分别进行交叉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而不是跨文化交际研究,所以他们无法回答当美国人和泰国人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交际双方的愿意度会不会发生变化。Kassing 认为,与文化集团内部成员(ingroup members)进行交流的愿意度(Intracultural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和与文化集团外部成员(outgroup members)进行交流的愿意度(Intercultural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不一定一致<sup>[11]</sup>,而这些不一致是由复杂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因素造成的。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主流研究缺乏跨文化敏感方面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对价值取向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集团的对比研究就更少了。跨文化敏感这一重要的交际变量被谈到的时候多,被研究的时候少。

跨文化敏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也有多个层面的特点。Chen 和 Starosta 认为,跨文化敏感度较高的人首先是自尊自爱(self-esteem)<sup>[8]</sup>的,自尊自爱在此指的是具有自我价值意识。当处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他们有很强的应付陌生环境、挫折和压力的能力,并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第二,他们有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的能力,这种能力指的是他们能够根据交际场合和情景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有研究表明,自我监控能力比较好的人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能较好地集中注意力、更多地以对方为中心,同时,还能够根据语境的暗示调整自己的表述方式<sup>[12][13]</sup>。第三,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open-mindedness)。所谓思想开放指的是他们愿意描述自己,也愿意接受对方对自己的描述,他们承认、接受和欣赏不同的观点以及对方的差异。第四,他们能够设身处地(empathy)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和感受交际过程。第五,他们会采取非判断方式(non-judgment)进行交际。所谓非判断方式,指的是在交际过程中能认真倾听对方,而不急于下结论。第六,他们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所谓参与意识,指的是“交际敏感”,它包括反应能力、注意力和认知能力。

根据以上对跨文化敏感这一概念所作的定义,Chen 和 Starosta 首先设计了 73 个李克特量表来

测定跨文化敏感的6个特点。他们在留学美国的国际学生中收集到数据后,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减去因子负荷(factor loading)值在0.5以下的49个问题,然后用保留下来的24个问题组成量表,并在这一群体中再次进行有效性和可靠性测试,最后于2000年在国际上发表了该研究所采用的跨文化敏感量表。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跨文化交际能力被浅论和试论的时候多,真正对其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少<sup>[12]</sup>;在我国发表的绝大多数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当中,跨文化交际能力被当成语言(或语用)行为或能力来看待的时候多<sup>[14][15][16]</sup>,当成非语言行为和能力的時候少,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就更少了。笔者对1994年到2003年近十年来发表在国内564种学术刊物上的1109篇有关跨文化研究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后发现,采用科学方法进行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成果只占全部论文总数的3.79%<sup>[17]</sup>。看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国际主流研究还有很大的距离,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果

本研究采用了Chen和Starosta开发的跨文化敏感度里克特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该量表将跨文化敏感分为五个层面,分别是交际参与度(interaction engagement)、差异认同感(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交际信心(interaction confidence)、交际愉悦感(interaction enjoyment)和交际专注度(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各层面的量表举例如下:

交际参与度:I enjo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差异认同感:I think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es are narrow-minded.

交际信心:I am pretty sure of myself i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交际愉悦感:I get upset easily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交际专注度:I am very observant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分别于2004年4月和5月在中国和泰国收集。中国的数据包括汕头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生、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汕头地区某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中国样本中的英语专业本科生和跨国公司员工由于抽样框架(sampling frame)不大,因此被全部收到本研究的样本中。泰国的大学生样本来自曼谷Kasetsart大学,跨国公司员工样本来自曼谷一家大型泰美合资企业,由于抽样框架过大,因此采用了系统抽样的方式。中、泰样本中的跨国公司员工全部都是中层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都需要和美国同事用英语进行交流。因此,这一取样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全部量表被翻译成中文或泰语后使用,这是为了防止因语言误解而影响数据的准确性。数据分析采用的是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中的 $3 \times 2$ 设计,或称为双向方差分析(two-way ANOVA)。样本成员间有两个自变量:一个是国籍,它有两个值,即中国和泰国;第二个是成员类别,它一共有三个值,即英语专业本科生、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跨国公司员工。因变量是跨文化敏感,其数值是样本成员分别在五个不同层面上的算术平均数的和。

数据分析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首先,中国样本成员的总体跨文化敏感度比泰国样本成员高;第二,在中、泰样本内部,都是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敏感程度最高,其次是跨国公司的员工,最低的是非英语专业学生。数据分析结果没有产生理想的预测跨文化敏感度的模型。在两个影响跨文化敏感度的变量——样本成员类别和国籍之间,也没有产生显著性交互效应( $\text{partial } \eta^2 = 0.006$ ,  $p = 0.093$ )。但国籍( $0.057^{***}$ )和成员类别( $0.032^{***}$ )却分别对跨文化敏感产生了显著性主效应(见表1、图1)。

表 1 双向方差分析主要结果

差异来源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Partial Eta Squared
模型	12.639	5	2.528	17.97	0.000	0.098
斜率	10120.574	1	10120.57	71942	0.000	0.989
国籍	7.010	1	7.01	49.83	0.000	0.057
样本成员类别	3.835	2	1.91	13.63	0.000	0.032
国籍与样本成员 类别的交互效应	0.670	2	0.34	2.38	0.093	0.006
误差	116.198	826	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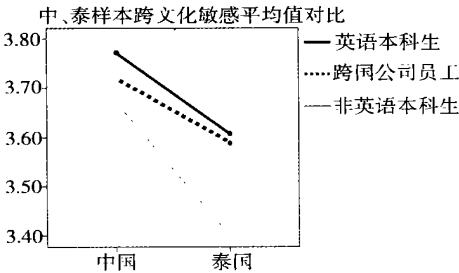


图 1 中、泰两国跨文化敏感度对比

四、结 论

尽管数据分析结果没有得出预测跨文化敏感度的理想模型( $R^2 = 0.098$ ),但从不同样本成员所具备的跨文化敏感的高低程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发现外语能力对跨文化敏感可能产生的影响。中、泰两国英语专业学生具有较高的跨文化敏感度,这一结果清楚地说明了语言学习尤其是外语学习与跨文化敏感之间的关系。当然,本次研究一开始就没有把英语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行测定,因此,样本成员的实际外语能力与跨文化敏感度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具有统计意义的实证数据的证实。尽管如此,中、泰两国的英语专业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在跨文化敏感度上的高度趋向一致,说明跨文化敏感度的高低与跨文化交际实践和外语学习都有关系。事实上,跨国公司员工的跨文化敏感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他们的跨文化交际经验,而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跨文化敏感则更多地来自于外语学习。可见,外语学习和跨文化经验都可以提高跨文化敏感。这也说明,外语水平不高的人同样可以通过实际的跨文化交际经验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敏感。Brislin 和 Yoshida 曾经指出:“获得高水平的外国文化知识不一定需要通过流利的外国语,而操流利外国语的人很可能是个文化知识上的笨蛋。”(A high level of familiarity with a nation's culture is not necessarily achieved through a high level of fluency in its language and that a fluent speaker of a foreign language can be just a 'fluent fool'.) [18]48

跨文化经验和外语水平这两个变量对于跨文化敏感度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不是一样的?跨文化交际经验又是如何构成的?哪些因素可能直接影响跨文化敏感度的高低?由于本研究没有考虑到对这两个变量行进测定和比较,因此无法得出具有结论性的推论。但本研究的结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空间。对跨文化敏感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对这两个变量的

主效应和交互效应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得出更具有理论意义的结果。

数据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人的跨文化敏感度比泰国人高。这一结果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泰国是以旅游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国家,每年到泰国旅游的外国人达数百万之多,与广东汕头相比,曼谷更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大都市,泰国人接触外国人并与之进行交流的机会应该远比样本中的中国人多,但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国际化大都会中,曼谷的大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的跨文化敏感仍然没有样本中汕头的大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的高,对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于文化成员的跨文化敏感影响远远没有外语学习来得重要,换句话说,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广泛程度远比泰国人高得多。第二,根据 Chen 和 Starosta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跨文化敏感只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因此,跨文化敏感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跨文化能力的高低。交际对象会因为所属的文化集团不同,而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所包含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各层面之间产生分布上的个体或团体差异,这些差异不一定会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反映出来。由于跨文化敏感主要反映的是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我们必须将这五个层面分开进行测定才能知道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影响的大小,这就给我们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其他层面进行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和测定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总体来说,霍夫斯塔德<sup>[3]</sup>和霍尔<sup>[19]</sup>的经典文化理论虽然采用二分法将文化分成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集团,但属于文化价值取向相同或相似的集团内部存在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这些差异对于我们完善或创建更加符合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理论是有帮助的。

在对相同价值取向的文化集团成员进行对比研究的时候,本研究的局限比较明显。除没有将外语能力作为变量进行测定外,其他可能影响跨文化敏感的变量,如样本成员的性别和跨国公司员工的工作性质也没有被测定。希望对跨文化敏感有兴趣的研究人员进行类似对比研究设计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变量。

## [参 考 文 献]

- [1] GUDYKUNST W B, GAO G, SCHMIDT K L, et al.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elf-monitoring, and predicted-outcome value on communication in ingroup and outgroup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1992, 23(2): 196 - 213.
- [2] HALTUNG P J, SPEIGHT J D, LEWIS D M.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the vocational behavior of majority culture college students[J].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96, 45(1): 87 - 96.
- [3]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 [4] 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M]. Loddon, Norfol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UK) Limited, 1991.
- [5] KAPOOR S, COMANDENA M E I.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Individualist/Collectivist [J]. *World Communication*, 1996, 25(4): 169 - 176.
- [6] CHEN G M, STAROSTA W J.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J]. *Human Communication*, 1997, 1(1): 1 - 16.
- [7] WISEMAN R 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GUDYKUNST W, MODY B, Eds.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C]. Newbury Park, CA: Sage, 2001.
- [8] CHEN G M, STAROSTA W J.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nsitivity scale[J]. *Human Communication*, 2000, (3): 1 - 15.
- [9] MONTHIENVICHICHAI C, BHIBULBHANURWAT S, KASEMSUK C, et al. Cultural awareness,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n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case study of Saint John's international school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2002, 161(6/7): 288 - 296.

- [10] KNUTSON T, KOMOLSEVIN R, CHATIKETU P, et al. A comparison of Thai and U. S. American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2, 31(1): 3 - 12.
- [11] KASSIG J W.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cultural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scale[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997, (14): 399 - 407.
- [12] BERGER C R, DOUGLAS W. Thought and talk: Excuse me, but have I been talking to myself [A]. F. E. X, Dance.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parative essays[C].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42 - 60.
- [13] SPITZBERG B H, CUPACH W 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4
- [14] 林大津. 跨文化交际能力新探[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3): 58 - 62
- [15] 刘学惠. 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 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166(1): 34 - 36.
- [16] 牛桂玲.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新编大学英语》的教学[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5(3): 143 - 145.
- [17] 彭世勇. 我国人文学术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J]. 现代大学教育, 2004, 87(3): 11 - 15.
- [18] BRISLIN R, YOSHIDA 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ining: An introduction[M]. Thousand Oaks: Sage, 1994
- [19] HALL E T. Beyond culture. Garden City[M]. NY: Anchor, 1976.

[责任编辑 何海峰]

## Influence of Nationality and Profession o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PENG Shi-y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Guangdong 515063, China)

**Abstract:** A survey of 833 college English major and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as well as multinational employees from China's Mainland and Thailand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 nationality and profession; dependent variable i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which is conceptualized as consisting of five dimensions, namely, interaction engagement, 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teraction confidence, interaction enjoyment, and 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 Scale examples of each dimension are as follows: Interaction engagement: I enjo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I think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es are narrow-minded; Interaction confidence: I am pretty sure of myself i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action enjoyment: I get upset easily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 I am very observant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Major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indicate that Chinese subject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than Thai subjects. The between-subjects differences show that English major students and multinational employee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than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mply tha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the building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s i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nationality and profession was not discovered from data analysis.

Although data analysis did not generate an ideal model ( $R^2 = 0.098$ ), from the various levels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of the subjects, we can clearly see the possible impact of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o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Both the English major students of China and Thailand have higher levels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This fact suggests that language learning, especiall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This study also discovered tha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s related with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fact,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mployees mainly comes from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whereas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of English major students mainly comes from thei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oth China and Thailand are collectivistic countries with a lot of cultural and traditional similarities. However, the overall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nfirm that cultural groups with the same or similar value orientation may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each other in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behavior in one way or another, a fact that classic cultural theories do not attempt to explain. It is the limit of this study that English proficiency was not conceptualized and operationalized for a comparison across subjects.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ailand; China

## 中英姓氏的溯源与比较

谢屏, 廖方军

(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人类姓氏的起源和沿用,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姓氏与语言等各种现象一样,与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从某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历史、习俗与伦理道德等多种信息。从姓氏比较的角度来探索英语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人文演化,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探索语言规律。

1. 姓氏的起源和发展。现代英美民族的姓氏大多起源于中世纪,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来(《圣经》姓氏)、古希腊和古罗马。在诺曼底人入侵英伦三岛(1066)以前,英国人只有名而没有姓。公元9世纪到15世纪是英国封建主义的发达时期。伴随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英国人口急剧上升。为了增强人名的社会区分职能,英语民族的先辈便开始采用附在人名后面的个人附加名,以区分人名相同的状况。如一个名叫John的人,其职业是厨师(the cook),人们就叫他John the Cook(厨师约翰)。直到11世纪,一些贵族家庭才开始用封地或宅邸名称呼一家之长(类似于中国的封地赐姓宗法制),后来世代相袭形成了姓氏。姓氏的使用首先见于伦敦等大都市,到了16世纪末才被大众接受。作为“新大陆”的美国境内的居民,他们的姓氏是在16世纪由于欧洲白人的纷至沓来才开始出现的。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当地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只有名而无姓氏。中国人的姓氏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形成相对固定的姓氏体系是在秦汉之后。当时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出生便有姓氏已成事实,除了改姓的原因,似乎再没有重新取姓的需求了。于是相对稳定的姓氏就这样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2. 姓氏源头的相似性。姓氏的形成,与各民族所处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以及他们的社会心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尽管中西文化差异较大,但英汉姓氏源头的相似点却不少,从中我们也许能悟出些“异曲同工”之妙。(1)以地名为姓。世界各民族的姓氏都与地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汉姓氏也不例外。中国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封国赐姓的宗法制,这些国名便成为诸侯后裔的姓,如郑、卫、许、鲁、杨等。英语中用作姓氏的地名通常指英美人祖先的出生地或故居地,包括州、郡、城、乡名,也有山河湖泊、森林草原、岛屿名等。例如:作为姓氏的Tennessee(田纳西)源自美国东南部一州(或湖)名,Maine(梅恩)源自美国东北部一州名,美国小说家Jack London(杰克·伦敦)的姓氏源自英国首都伦敦。(2)以职业名称为姓。中国古代各种制造技艺传授的主要途径是子承父业,以避免同行竞争。同时官府推行限制工商业改变社会身份的政策,于是,职业名称亦成为代代操持某技艺之家的姓氏。如制作陶器的人就姓陶,以捕鱼为生者则姓渔,以宰杀牧畜为业的就取姓为屠。还有匠、巫、甄等姓氏均属此类。这与英语中以职技为姓氏不谋而合。如最常见的Smith(史密斯)就是出自“金属工匠”(smith),Carvert(卡弗)出自“雕刻工”,Carte(卡特)出自“马车夫”,Carpenter(卡彭特)出自“木工”,Fisher(费希尔)出自“渔民”,Butcher(布彻)出自“屠夫”,Sailor(赛勒)源于“船员、水手”等。(3)以先辈姓名演绎为姓。孔子有弟表字季牢,其后辈便以“牢”为姓;周代宗国公子目夷,字子鱼,其子孙为“鱼孙”氏。这类现象较多地出于贵族后人,而贵族表字中常带“公”、“子”者极多,是爵位的表示,由此产生了诸如公子、公孙、公父、公石等许多复姓。英语中的Johnson(约翰逊)作为姓是从专作字用的John变异来的,在其后加上-son以示为John之子。有些姓氏是根据教名的异体或昵称衍生出来的,如John的子孙姓氏便有以下多种形式:Johns, Johnson, Jones等。(4)以颜色名为姓。《百家姓》中有“红”姓,此姓为汉代元王刘交之子红侯刘富的后代,“黄”、“蓝”、“白”等姓较多,分布也广,“青”姓较罕见,但南北均有。英语中借颜色称姓的更为常见,如Red(雷德)借红色,Green(格林)借绿色,Blue(布卢)借蓝色,Brown(布朗)借褐色,Grey(格雷)借灰(白)色。这些充当姓氏的颜色词可以反映出持姓者的祖先或偏爱某种颜色,以借此表达某种意向,或属于某类肤色的人种。(5)以金属名称为姓。(6)以官职名称为姓。古时夏、商、周三朝均设官职,任官者的后代多以祖先的官职名称为姓。如复姓上官、皇甫、司马、司徒、司空、太史、侯史等。有的从官名称中截取一字为姓,如“钱”姓是从周代的钱府土上来的。亦有家族世代为官,干脆以官名为姓,如“司马”、“司空”、“司寇”等。英语中也有不少以官职为姓的,如Marshall(马歇尔)源自中古时期王宫的司令官和宫廷内的司法官名,现代用以称“元帅”;King(金)取自“国王”;Queen(奎恩)取自“女王”或“王后”;Noble(诺布尔)取自“贵族”头衔。取这些官名为姓者无非是为了显示家庭地位。(7)以植物和花果名为姓。以植物拟姓的,中国有梅、韭、荔、梨、棉、槐、花、瓜、果等。有些姓氏则经历了植物、地名或官名、姓氏的过程,如复姓“高粱”从地名来,在今山西临汾东北。英语中作姓氏的植物花果名也较普遍,如Bush(布什)取自灌木丛,Rose(罗斯)是玫瑰花,Rice(赖斯)是稻谷,Reed(里德)是芦苇,Stock(斯托克)是紫罗兰,Tree(特里)是树木,Lotus(洛特斯)是荷花等。绿色植物的寓意是“生机、和平、丰硕与希望”,花果则暗示出“美丽、幸福、收获与成功”,这些含义都是人们所向往的,借此为姓,何乐不为?(8)以动物名称为姓。《中国姓氏集》收录以飞禽走兽名为姓氏者不少,如虎、豹、貂、骡、马、牛、羊、狗、猫等,天上地下水里的都有。如进一步考源,其中有的姓是古代邑名而来,邑名又多为封国名,封国名又含古人作为图腾(图腾)所崇尚的各类动植物名。如较常见的“鹿”姓,出自邑名,系今河南濮阳东北,亦有出自官名的,如“公牛”,周朝有主管公牛的官,名牛人,遂以官职为姓,后简称“牛”姓。英语以动物为姓氏的也较多,如Bird(伯德)出自鸟,Buck(巴克)出自雄鹿,Bull(布尔)出自公牛,Crane(克兰)出自鹤,Eagle(伊格尔)出自鹰,Fox(福克斯)出自狐狸,等等。这些英语姓氏表示持姓人的祖上赏识某种动物禽鸟,赞叹其占优势的某种本能、特征、外貌、性情或姿态,因而取其名为姓,也算古时作为区分族姓的依据。(9)从宗教信仰方面来取姓。比如历史上华夏民族有“盘古”复姓,以神话中开天辟地之祖盘古为姓;英语中有以“基督”(Godman,戈德曼)为姓者。古时信奉宗教极普遍,所以姓氏中有的就反映出宗教色彩,华人有“佛”、“佛图”等姓,因先人习佛图之教,故以此为姓。英美人有以James(詹姆斯)、Peter(彼得)、Daniel(丹尼尔)等取自《圣经》中的人物为姓者,还有那些圣徒在姓前加St.(Saint),如St. Leger(圣莱杰),St. Maur(圣莫尔)等形形色色的姓,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某种信仰。

在语言起源问题上学术界有一源论之说,认为人类语言同出一源,尽管世上各种语言差异纷呈,但这些差异都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若如此,那么,载于语言的姓氏之间便有着缘关系,而姓氏起源的相似性似乎又可以做为佐证。